

复合群众运动中的宣传、行为及其结果 ——对于“黄逸峰事件”的个案分析

刘一皋

【内容提要】 共和国建立初期是大规模群众运动的高发时期,特点是多个运动同时进行,内容基本涵盖了国家各项重要工作,也大大增加了运动过程的复杂性。本文围绕“黄逸峰事件”,透过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从创办到终结的全过程,描述了复合群众运动环境下可能出现的内在矛盾冲突,及其间学生如何利用运动目标的多样性及话语表达自己的意愿,领导者如何组织斗争和运动中权力位置的移动,并分析了批评、反批评和大批判所使用的话语特征,以及掩盖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下的行为特征。本文揭示,由于目标选择和参与行为的不确定性,复合群众运动的可控性很弱,运动过程的偶然性增强,并往往背离运动的既定目标。在“黄逸峰事件”中,学校领导、学生和学校本身,以及作为运动传媒的报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损害,或无法发挥预想的作用和使命,或远远超出了各自行为的原本期待。

共和国建立初期,各类群众运动频繁发生,基本涵盖了国家各项重要工作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群众运动的参与方式,对于较长时期的社会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既往对于群众运动的研究,偏重于单个运动的过程分析,如若涉及两个或更多运动(同时的或前后的)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也多是直线性的简单联系。“三反”运动、“新三反”运动中的“黄逸峰事件”研究亦如此,或关注不足,或强调事件发展的高层干预因素和黄逸峰的个人遭遇,或将事件直接演绎为权力斗争的一部分。^①事实上,群众运动作为全能性一揽子解决的动员参与形式,其过程和内容更为复杂。革命战争时期的成功经验如何在建设时期运用并与时俱进?新生事物为什么会成为运动中的调整、整顿对象甚至夭折?传媒上的公开批评为什么会由高调提倡转入谨慎控制?运动的领导者、积极分子与批判、斗争对象的角色为什么会出现急剧转变?普通群众是否只是运动的被动参与者,以及在运动中如何寻求个人利益?都是群众运动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文以“黄逸峰事件”为分析对象,以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命运为叙述主线,揭示处在各类群众运动频发时期,在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宣传氛围下,基层单位开展运动的具体环境,领导和群众如何选择各自的行动方式,运动目标及话语如何与单位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以及群众运动对于权力行使的制约和高层干预对运动走向的影响等,借

^① 王顺生、李军的《“三反”运动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中,没有提及黄逸峰案,也未能从正面讨论官僚主义问题。林蕴晖的《惊动毛泽东的“黄逸峰事件”》(《国史札记·事件篇》,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和陈建云的《“黄逸峰事件”惊动高层》(《同舟共进》2009年第6期)都强调高层干预因素,后者从新闻史的角度还罗列了《解放日报》的批判。有关《解放日报》的批判,强调张春桥过于激进的观点也很流行。见史云编:《张春桥姚文元实传——自传·日记·供词》,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第121页。姜铎的《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更为突出黄逸峰个性在悲剧中的意义。互联网络上广泛流传的向德撰《“高饶反党同盟”真相》,借陈毅讲话,将“黄逸峰事件”归之为饶漱石“挟嫌报复”而制造,强调权力斗争因素。见<http://club.china.com/data/thread/5688138/29/54/9-1.gtml>。

以展现复合群众运动中目标选择的多重性和易变性对于运动形式及全过程的影响。

一 新型学校的创办及发展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又以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最为迫切。1951年夏,华东第二届交通会议决定迅速开办交通运输干部学校,经过紧张的筹备和规划升级,9月17日,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正式成立。据《文汇报》报道:“华东交通部为了发展华东交通业务,完成交通建设的重大任务,急需大量交通建设人才;尤以公路航运及交通管理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需要更为迫切。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成立了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由华东交通部黄逸峰部长兼任校长,这是由业务部门直接掌握的一所新型学校。”^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能够快速创办,并由原设想的干部培训班式的干部学校,升格为创办一所高等技术专科学校,明显受到主管业务部门的推动,主要是得到黄逸峰的大力支持。

黄逸峰,江苏东台人,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以后,历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南通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全国铁路总工会秘书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历任新四军联抗部队司令员、苏中军区一分区司令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历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交通处长、东北铁路总局副局长、铁道学院院长、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等职。南下进入上海后,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铁道处处长,负责接管上海铁路并任上海铁路局局长,后任华东财经委员会运输部部长。1950年3月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并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委员。除革命履历十分抢眼之外,黄逸峰还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抗战初期一度担任广西大学会计学教授,建国后又兼任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上海航务学院院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成立》,《文汇报》1951年9月18日第4版。

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交通大学教授等职,对于高等教育和从事学术工作有特殊的偏好,这在当时拥有实权的强势高级干部中较为罕见。

所谓新型学校,除了由新生政权创办,有新领导、新使命之外,还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特点之一,是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创办体现了共和国初期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向,即学习苏联经验,由政府业务部门参与设立并直接管理相应对口的专业技术学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东北地区已经着手尝试并取得了一些经验。^①在1950年6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尽管就如何理解大学的任务以及大学与专科学校的区别,如何理解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存在不同认识,但是,基本接受了苏联专家的意见,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服务;由教育部与各业务部门合作,加强中国人民大学和其他新型高等学校的教育设施,创设各种专科学校,并在各大学各学院添设必要的系和设立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②1951年8月10日,政务院第97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明文规定高等学校分大学、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大学和专门学院修业年限以三年至五年为原则(师范学院修业年限为四年),专科学校修业年限为二年至三年;各种高等学校得附设专修科,修业年限为一年至二年,并得附设先修班或补习班,以便利工农干部、少数民族学生及华侨子女等入学。并规定“高等学校毕业生之工作由政府分配”。^③

① 在整顿现有高等教育并建立新型正规的教育制度的过程中,东北行政委员会试图将东北高等学校全部转变为正规的能担负起培养现代专门技术人才任务的学校,决定设立沈阳工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沈阳农学院、哈尔滨农学院、沈阳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外国语专门学校及专门培养中学师资的东北大学等12个专科以上学校。参见《适应大规模建设需要,东北整顿高等教育,培养专门技术人材》,《人民日报》1949年8月7日第2版。

② 马叙伦:《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开幕词》,《人民日报》1950年6月14日第1版。

③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人民日报》1951年10月3日第1版。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是在地方政府和华东教育部的大力协助下,由华东交通部负责创办并管理,以满足交通部门自身的技术人才需求,是典型的对口设立并由政府业务部门直接管理的高等专科学校。在筹备过程中,华东交通部提出“交通部门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号召,各单位及有关业务部门都参与了建校工作,例如,将一些在职干部调到学校充当专任或兼任教师及行政干部;各省交通厅处向学校捐赠了图书书款,奠定了图书设备的基础;在紧张的招生工作中,交通部临时组织了130个干部参加工作,星期例假也不休息;以及交通部“负责干部夜以继日的积极从事策划”。^①实现了学校创办、业务及行政管理和毕业生使用的高度统一,以适应即将全面到来的计划经济体制。

特点之二,是在贯彻新教育指导思想、办学方法和培养目标的同时,还肩负着改造旧学校的职责,尤其是对于私立学校的改造。共和国初期,对于私立学校采取“除极坏者应予以取缔或接管外,一般地应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②又规定:“少数办理太坏而确实无法维持和改造者,可劝其和其他学校合并,其学生及教职员,均应以适当的安置。”^③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随着新制度的逐步建立,私立学校在经费筹集、学校管理、系科设立、学生来源等各方面,都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1950年7月28日,政务院第43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均负有领导责任,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军政委员会教育部或文教部均有根据中央统一的方针政策,领导本区高等学校的责任。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是怎样办起来的》,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28。文件未标明制作的具体时间,从内容上判断,制作时间应为1951年年底或1952年年初,可视为对《人民日报》刊登批评信的组织回应。

②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钱俊瑞副部长总结报告要点》,《人民日报》1950年1月6日第3版。

③ 《政务院关于救济失业教师与处理学生失学问题的指示》(1950年7月5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通过,7月25日政务院批准),何东昌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49—1975)》,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39页。

中央教育部所颁布的高等教育方针、政策、制度、法规、指示,以及高等学校的设置变更或停办,大学校长、专门学院院长及专科学校校长任免,教师、学生待遇,经费开支标准等决定,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的日常行政、教师调整配备、经费管理、设备及参观实习等事宜,得由政府有关部门直接领导。^① 私立高等学校的生存空间被压缩,抗美援朝运动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又大大加速了私立学校的合并与改组。

在华东区,私立南京工业专科学校被直接改为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私立光华大学主体成为新组建的华东师范大学的一部分,土木工程系、科并入同济大学,财经、政治、法律等系分别并入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学院,^②公路专修科则被并入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如此,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有了基本的校舍,有了20人左右的专任教员队伍和一些必要的教学设备,得以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和交通管理三科,在短时间内正式开学。

特点之三,是学校的创办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要求迅速见效和因陋就简,试图在实干中克服困难并求得发展。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所接收的南京工业专科学校校园面积仅十余亩,大小房屋十余幢,而且破旧损漏不堪。经过紧张的维修、改建,并在政府协助下清退了占住的40余户人家,到正式开学之时,主要校舍为东大楼教室15个,依计划50人一间教室计算,可容纳750人;西大楼用作办公室、会议室、工会办公室和教员休息室,三楼为教职员宿舍;东小楼为学生会、党团办公室和班主任室;西小楼二楼全部为教职员宿舍;礼堂一座,可容纳500人,供上大课使用;新平房全部用作图

①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人民日报》1950年8月3日第1版。

② 《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已作适当调整》,《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2日第3版。调整前,华东区原有公私立高等学校75所,系、科达548个;调整后公私立高等学校减为59所,系、科减为404个。

书馆,小平房为医疗室;另有几间平房为实习工场,一块小球场等。^①虽然如此,新学校校区又扩充了十几亩,准备兴建大礼堂、教室大楼、实习工厂、实验室、医疗室、宿舍、厨房等设施。^②创办之初的修建计划只列有“建一座能容一千二百人之礼堂,兼作五百人一次用膳之用”,“简单厨房四间”,“一百加仑茶水锅炉二只”和公共厕所一座,^③明显受到资金、物资和基建力量的制约。

学校能够接收的教学设备少得可怜。“土木科方面仅有光华大学移来水平仪、经纬仪五架,机械科方面仅南京工专留存马达一部,车床一部,老虎钳二十把,图书设备,仅有百数十册,其他如床铺、课桌椅、饭桌等设备,照实际需要,不敷甚钜,均须大量添置。”^④解决的办法除新购外,主要通过部门内部调拨和借用,或是免费提供实习场所。师资不足的解决方法相类似。“一年制师资由交通部调派在职干部来校任课。每种课程,均用集体教学方法进行。”针对不同科目,指定部门内部的相应具体单位负责。“二、五年制师资由前南京工专、光华大学及新聘一部分教员暨交通部在职干部来校兼课各教员担任。”^⑤

尽管办学基础薄弱,但是,肩负重大使命的新型学校还是在短时期内便迅猛扩张,速度远快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及发展。

学校筹备之初,原预定招收学生 300 名,即基本维持旧有学校的规模。7 月间,计划突然膨胀了数倍,要求到 1951 年下半年,学生人数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舍修建及约估预算》(1951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5-6。在发起批判黄逸峰运动后,为了论证薛承凤批评大部分都有事实根据,认为“当时该校的确没有图书馆,只有阅览室,书籍很少;实习工场虽有土木、锻工两个,而翻砂、焊工、机械等都没有工场”。解放日报编辑部:《黄逸峰等压制批评、欺骗组织的事实经过》,《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23 日第 3 版。

②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成立》,《文汇报》1951 年 9 月 18 日第 4 版。该报道称上述设施“不日即可动工”,显然带有宣传或想象的成分。

③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舍修建及约估预算》(1951 年)。

④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工作总结(1951 年 8 月至 1952 年 12 月)》,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28。文件未标明制作的具体时间,从内容上判断,制作时间应为 1952 年年底,可以视为是为应付华东局工作组检查而制作,或是为了应付新一轮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⑤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概况》(1951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28-4。

达 24 班 1260 人,其中包括南京工业专科学校移交学生 260 人,由光华大学土木科拨来学生 100 人,招收新生 400 人(二年制土木二班、机械一班、管理一班;五年制亦同),一年制干校学生 500 人。^① 7 月底,计划有所下调,学生名额定为 800 人。临到学校正式成立,已有二年制、五年制专科学生 565 人,一年制干部学习班学生 338 人。^② 此后,又陆续接受各省区保送学生 200 余名,一年制干校学生达 535 人,至 10 月上旬,全校学生人数已超过 1100 名,^③规模远超旧有学校,接近计划中的高限指标。

学生人数骤增体现了新国家快速发展的意愿,然而,在设施简陋、新旧并存、学制杂乱的情况下,过快的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对学校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学校硬件设施短缺问题一目了然,根本改变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作为新型学校,首要问题是明确办学目标和培养方向,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教学质量。学校的办法是“教师们采取集体备课的方法,结合现场参观与实习进行教学”,^④明显源于战时经验。然而,在具体操作上却存在诸多困难:其一,师资程度不同,集体备课可能统一教学内容和程度,却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师资是否合格的问题,兼职教师比例过大亦影响正常的教学秩序;其二,教学参考书严重缺乏,教材改造及重新编写任务繁重,基本还未能切实展开,基础理论教学缺少称职的助教辅导,专业实践课程除缺乏课余辅导外,还受到器材、场地的严重影响;其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学生同时入校,对于教学内容、进度及培养方向都有着不同的要求,教学工作一时很难适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舍计划草案》(1951 年 7 月 27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Q259-2-6-1。二年制专科生招生对象为高级中学及同等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五年制专科生招生对象为初级中学及同等学校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者。之所以出现五年制,主要原因是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缺乏合格生源,五年制有先修班、补习班之意。

②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成立》,《文汇报》1951 年 9 月 18 日第 4 版。

③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是怎样办起来的》。

④ 同上。

应各层次学生的需要,学校工作实际偏重临时干训班形式,更加重了“教”与“学”的矛盾,模糊了办学目标,令人对学校的前途产生疑虑。

其实,上述问题在战时经验中都或多或少存在,本不该成为发展中的严重问题。但是,校方与学生之间对于新型学校的期望存在明显距离,也就难免出现意料之外的各种新情况。

对于校方而言,学校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只是眼前困难,应该服从国家建设需要,提倡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可是,上海滩的学生,毕竟与战时投奔革命根据地的进步知识青年有所不同。进入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学生,大都有其个人的梦想或打算,有的以为交通部门有铁路,将来可以得到较高待遇;有的以为一年制干校和军干校一样,自己当干部,家庭又能享受军属待遇;有的认为反正是公费,招考标准又低,先进上海看看,不好再说;还有的是为了逃避土地改革运动,或为了找爱人及照顾家庭;等等。这些学生进入学校后,普遍对条件不满,“认为自己的学校不是大大学,设备简陋,不能安心于学校初创时期的物质条件”。^① 教师思想问题没有学生那样明显,但也普遍存在学校前途与个人去向的忧虑,以及不同来源教师之间的磨合问题。

面对新环境,校方显然没有做好开展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准备。根据经验,校方将上述现象归之为“非常浓厚”的“小资产阶级的片面性和过急性”,抱怨这些学生没有体谅“校方对改进教学可以说不遗余力”的努力和“已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只会纠缠嫌宿舍和教室分散,嫌没有参考书,没有桌凳,要露天上课和小组座谈等枝节小事,“不甚了解”“以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来办学校的意义”。^② 并通过阶级分析寻找思想问题的根源。例如,在占学生总数近一半的一年制干校学生中,“据目前统计情况(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子弟即占五分三),大部分系小资产阶级出身,受资产阶级及旧社会反动教育的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九五一年第四季度工作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28。

② 同上。

影响很深,感情、宗派、自由散漫、自高自大、好高务远、自命清高,特别普遍”。^①要求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通过加强师生的思想改造,根本解决对于办学的思想认识问题。

另一方面,与教师员额不足的情况相比,行政职工队伍迅速膨胀。1951年年底之前,全校职工人数达到126人,其中教员61人。^②学校行政机构设置已近完整,正副校长之下设秘书长一人,下设校长办公室(设主任一人)和教导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总务处(设主任一人);教导处分设教务组、注册组、辅导组、图书馆,总务处分设事务组、供给组、会计组、医务组。二、五年制土木、机械、交通管理三科各设正副主任,各科并分设教学指导研究组;一年制分设五个队,各队设正副队长各一人。各种规章制度也很快建立起来,仅1951年10月,就建立了会议、考勤、星期日值班制度,制定了校历、聘任教员暂行规则、教学研究指导组组织简则、助教服务简则、宿舍规约、阅览室规约等规章。^③行政机构及规章制度的首先正规化,并没有给新型学校带来显著的秩序和效益,相反,“各科教学研究指导工作没有及时普遍展开”,部分干部“对教育工作的特点不够了解,工作方法生硬,致使校务行政事倍功半”。^④再者,学校正副校长由华东交通部正副部长兼任,简化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却不利于学校日常管理工作的开展,尤其是校长黄逸峰经常缺席学校行政会议,^⑤所谓“能者必多劳”^⑥现象,对于华

-
-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年制学员政治学习总结》(1951年),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30。
- ②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概况》(1951年)。
- ③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十月份工作简报》(1951年),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17-55。
- ④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是怎样办起来的》。
- ⑤ 据上海市档案馆藏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行政会议记录或行政例会扩大会议记录,与会者中均未出现黄逸峰的姓名,此类会议内容也未见讨论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决策,多为一般日常事务性工作。
- ⑥ 这是黄逸峰部下赞美黄的业绩时的一句话,称颂黄在共和国初期身兼教职且积极进取。李俊民:《黄逸峰同志八十大寿诞辰志庆》(1985年7月19日),《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第142页。

东交通专科学校并不一定是好事。

必须指出,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创办的,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不仅为校方借运动解决思想认识和教学管理问题提供了便利,也为普通学生参与校务并提出个人诉求提供了机会,尤其是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增产节约运动,提供了可模仿使用的普通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的话语和行为模式。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持续进行及不确定性,也给创办不久的新型学校带来了某些危机感,很容易与政治斗争捆绑在一起处理,只不过黄逸峰还沉寂在短时间就办起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成就感及得到上级好评的喜悦之中^①,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学校当作调整对象。

二 报纸批评与学生投书行为分析

为迎接共和国的建立,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讲话时强调,报纸和通讯社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中央就是依靠你们这个工具,联系群众,指导人民,指导各地党和政府的工作的”。^②要想充当指导工作和动员群众的导向,传媒就必须具有正确性和战斗性两大要素。然而,在批判或批评的主要对象由正面的敌人转为队伍内部的缺点、错误时,如何运用公开传媒并实现目标,尚缺乏成功的经验。^③

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① 华东交通部秘书处副处长张启宗事后揭发,“一九五一年十月间,黄从北京回来,他喜气洋洋的告诉我说:‘中央说我们华东以一个月的时间筹办了一个学校是不容易的。’”《黄逸峰沽名钓誉招摇撞骗的卑劣作风》,《解放日报》1953年1月24日第3版党的生活栏。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99页。

③ 例如,1950年2月15日《人民日报》第5版《编者的话》称:“目前我国各地的地方报纸,一般是有不少成绩的。但多数报纸对地方生活的反映不够,关于地方生活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还作得较差,因此报纸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还不够大。”

以平原省向中央政府及华北局检讨一事为例，提出“公开地诚实地积极地进行革命的自我批评，正是为了加强、巩固与改善我们的事业，正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的政治警惕性和主人翁的自觉，训练他们管理国家的能力。”^①4月19日，经刘少奇直接领导起草并修改，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扩大了报刊进行公开批评的权力，规定：“在今后，报纸刊物的人员不能决定真伪的批评仍然而且应当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但是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又规定：“批评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②

在当时，倡导在报刊上进行公开的批评，是发起全党全军大规模整风运动的重要措施。很快，报纸收到的读者来信成倍增加，报纸发表的批评性报道和文章也大量增加，^③批评的语言也更为激烈，社会影响自然随之扩大。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并要求“党的报纸和宣传员、报告员，应积极参加这一斗争”，^④“三反”运动正式发起。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的

① 《人民日报》1950年3月24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92—193页。

③ 以《人民日报》发表的批评性报道或文章为例，1949年为347篇，1950年为753篇，1951年为1749篇，1952年为1741篇，1953年为1027篇。一般被认为批评旗帜鲜明、斗争坚决，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307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74、482—485页。

“读者来信”：①

编辑同志：我们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严重地存在着混乱现象：在分科方面，有一年制的交通运输管理科、土木工程科，有二年制的机械、土木两科和五年制的管理、土木、机械等科。我校的校址狭小，设备简陋，没有图书馆，没有实习工场，缺少供实验用的机器。但学校领导方面不去设法改善教学上的设备，却花了二十亿元人民币盖了一座大礼堂，在开学典礼时，并大事铺张浪费。由于学校行政领导的松懈，我校至今还没有订立爱国公约。有很多教师仍用英文讲课，使同学们听也听不懂。学校行政方面对学生的退学、转学事宜亦不加过问。

我们希望有关部门注意我校的混乱情形，将来在进行院系调整工作的时候，对我校加以适当的调整，或把我校全部归并入大学的工学院（我校离交通大学是很近的）。这样不但可以为国家节省教育经费，并且可以集中力量办好专科教育。

上海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一群学生

这封“读者来信”成为“黄逸峰事件”的导火索。

《人民日报》为什么会发表这封“读者来信”，其中细节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可以肯定的是：第一，《人民日报》为开展“三反”运动宣传，需要此类稿件，以证明官僚主义、铺张浪费现象大量存在，并作为运动发起之民意。至于为何被选中，则可能纯属偶然。第二，《人民日报》在发表时，没有依规定核实批评内容的真伪，而是想当然地认为批评的正确，主旨仍是宣传之需要。其实，委托驻上海记者加以求证并非难事。第三，报纸的编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情况，以为就是一所不知名的小学校，根本无力与中央党报的权威抗争。如果他们向有关部门征求意见，或华东局办公厅，或华东局交通部，可能在发表时就会更加慎重，或不予公开发表。

至于“读者来信”的作者向党报投书反映学校情况，是响应党的号

① 《人民日报》1951年12月3日第2版读者来信栏。

召的正当行为,也是积极参加群众运动的权利。来信的作者,事后被证实为该校二年制机械科学生薛承凤,署名“一群学生”,也许是因担心会遭受打击报复而不愿署真名,但是,将个人行为冠之以“一群”,则完全是群众运动中的惯常用法。在运动中,无论是各级领导人的讲话,或是有机会进行公开表达的各界代表人物的言论,均习惯使用复数形式阐述观点,似乎他们可以代表群众或整体发言。此种表达习惯也被普通群众广泛效仿,一来使得个人意见更具普遍性、合理性,二来也多少为弱势者的发声壮胆,以“群众”的名义向权威挑战或提出个人的要求。

对于公开批评,署名方式并不十分重要,问题的关键是来信内容的真实性,以及投书中央党报行为的必要性。

依据学校档案文件、“读者来信”发表后学校的答复和“黄逸峰事件”定性后的批判材料分析,薛承凤投书中的所谓“事实”,大致可以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学制分科混乱和设备简陋客观存在,这是新型学校创办和国家建设需要的正常现象,不但上级领导十分清楚,而且长期以来得到鼓励和支持,^①只能有计划、有步骤地改进。之所以会成为问题,只是特定运动环境下的特殊产物。第二,“读者来信”批评的核心问题是修建大礼堂和开学庆典,学校答复大礼堂修建费用只有6亿元,开学典礼在大操场上举行,台子是同学们自己搭的。^②定案时的事实认定承认20亿元的数字是薛承凤照学生会黑板报写的,但肯定

① “黄逸峰事件”后,强调物资条件和正规化并未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而是不断地遭遇政治批判,例如“大跃进”时期的“两条腿走路”现象和“文革”时期的电影《决裂》。

②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对读者批评的答复》,《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第2版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栏。校方提供的数据基本属实。据1951年校舍修建预估算,添建部分中的大礼堂全部工程费约估为5亿元,预估算总额为9.5亿元。(《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舍修建及约估预算》,1951年)即使如此,大礼堂修建费用仍占预估算总额的一半以上,在经费紧张而需求众多的情况下,也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学校的请客是一种铺张。^① 第三,对于没有订立爱国公约和很多教师仍用英文讲课的批评,学校答复均以非事实反驳,定案时则被认定为事实,但也承认:“当薛承凤写信的时候,的确没有订爱国公约,后来才订了。”“虽然没有全部用英语的,但的确常常用英语解释专门名词,使学生听不懂。”在学校正式开学的一个多月时间内,订立爱国公约是否十分重要,取决于政治环境;至于在当时技术条件下使用英语解释专门名词是否属于教学问题,判断的标准就更为复杂。第四,对于同学退学、转学事宜,校方以依章办理回答,定案时也只查到确有一个学生没有办退学手续,也有些是在离校后才补办手续的,是学校敷衍不办还是自行离校未加说明。

总之,薛承凤对于学校情况了解并不多,投书前也未认真核实批评内容。但是,他仍然有权力向上反映问题,更何况普通学生如何才能更透明地了解校务,本身就是一个群众运动中的重要问题。不过,依常理推断,批评是为了解决问题,对于本单位、本部门的批评最终还是需要本单位、本部门的积极行动,只是在言路受阻或不作为的情况下,才向上级反映或申诉。一开始便将问题直接上达或公开化,反而容易激化单位或部门内部的矛盾,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为什么薛承凤会选择直接投书党报呢?是否存在学生与校方的有效沟通渠道呢?校方对于学生的合理要求是否置之不理呢?这些问题在既往研究中都没有给予足够关注,但却对事件的发展走向有着重要影响。

实际情况并没有那样严重。虽然学校成立时间不长,学生会在群众运动中仍十分活跃,在薛承凤投书党报大致相同的时间段内,学生会汇总了各学制各班队同学意见,向校方提交了一份意见表,不但包括薛承凤投书反映的各种问题,而且更加详细、具体和尖锐。^②

学生会意见表向校方提出的各种意见多达 94 条,分为“对行政方面意见”(52 条)、“对教授意见”(15 条)、“对体育方面意见”(8 条)、“对

① 解放日报编辑部:《黄逸峰等压制批评、欺骗组织的事实经过》,《人民日报》1953 年 1 月 23 日第 3 版。

② 《意见表(华东交专学生会提)》(1951 年),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18。

图书馆意见”(9条)、“对医务室意见”(3条)和“对宿舍方面意见”(7条)几大类,其中,“对行政方面意见”占意见总数一半以上,内容涉及广泛,大到学校体制、组织分工、基建计划、设备采购、学生管理、工作作风,小到教室打扫、厕所卫生、教室添置衣帽钩、礼堂放置痰盂或石灰箱等,应该能够反映学校初建尚未走上轨道的一般情况。

与薛承凤投书相比较,学生会意见表的内容更为具体,批评语言更加尖锐,并提出了一些如何改善的建议,更接近于日常学习、生活的切身感受。学生会批评学校管理机构“组织庞大,分工不明确,因此对工作造成互相推卸,不负责,有问题迟迟不决”。教务处下属辅导组任务、范围及性质不明确,“很多事都由辅导组管理,结果什么都搞不好,希望改辅导组为政治教学委员会,负责帮助同学提高政治水平,同时辅导组对各班级情况不够了解,联系也不够,形成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总务处组织庞大,工作不负责任,请裁减人员以配合各处人员的需要。”“校医水平太差,看病马虎(如到宿舍看病,不带必须医药用品),看病手续太麻烦(看病先到事务处登记)。”“宿舍生活指导员与管理员对同学照顾不够,对生活指导不起作用。”对于某些具体负责的行政干部和任课教师,意见表直接点名批评,指责他们“作风不正派(如披衣、歪帽)”“办事敷衍”“态度不好”,要求校方撤换同学们以为不称职的教授,并要求“学校行政方面设立意见箱及专门答复同学们意见的布告栏,加强同学们的密切联系”,“校方对同学所提意见不定期解答”,对于所提各项意见“请速办理解答”。针对学校校舍、设备短缺,学生会除督促校方认真规划、切实实施和增加购置外,还提出在现有情况下,延长教室、图书馆开放时间,增加设备使用率,延长宿舍开灯时间以利自习,挖掘宿舍潜力,既保障卫生又方便学习等改善办法;对于教学秩序,学生会提出减少不必要的各项集会,政治大课请尽量在原定时间准时进行,希望教师少请假、不迟到和保证教学进度,增加有能力助教等建议;在日常生活方面,学生会提出添置运动器械和赶快修建足球场,不应偏重校队而应普遍领导展开体育活动,医务室在办公时间后应仍能看病,生病同学应及时隔离等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会意见表也揭露了一些学生素质、品行的问题

题,要求学校加强管理,维护正常的教学、生活秩序。诸如,“校方应周密防止偷窃现象,如查出同学有偷窃行为,应向全校公布”;“对部分行动如阿飞的落后同学,应加强教育(如上大课时抽烟等)”。“考试应严防作弊现象(部分同学作弊很严重)”。“所学各门课程应“经常测验”,以巩固基础知识等。显然,学生来源复杂,程度不一,不良行为也会进入学校,需要学校加强管理。

由此可见,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并非缺乏沟通渠道,相反,学生会在参与学校管理事务时甚至还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强势。其实,群众组织权威的抬升,正是群众运动中的特点。依据常理推断,薛承凤的投书行为与学生会意见表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即并不是学生会意见表遭校方拒绝的结果,校方不可能作出否定的反应,薛承凤也不是学生会干部或学生活跃分子。那么,在学生征集学生意见向校方提出交涉以求解决和改善时,薛承凤为什么还要在对学校事务了解不够且无新批评内容的情况下坚持代表“一群学生”向中央党报投书呢?

薛承凤来信内容简单无奇,但却是善于把握政治环境、运用群众运动话语的杰作。在“读者来信”中,大礼堂修建问题最为突出,这是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铺张浪费的较为常见的内容。再者,对于学生,大礼堂并不很重要,对于校方则不然,大礼堂可以用于集会、上政治大课和充当饭堂,尤其是集会,是新型学校最重要的公共活动。另一方面,来信中也提到了缺少图书馆、实习工场,却没有提及学生意见最多的宿舍问题,^①显然是在有意回避生活问题,也是公开批评时的惯常做法。对于“至今还没有订立爱国公约”的批评,就有些政治挂帅的意义了,在运动中有将批评对象一击致命的作用。来信抱怨学校教学质量差,理由却是“很多教师仍用英文讲课”,表面上看,批评似乎不能成立且很荒唐,但也是当时运动环境的产物。为什么“听不懂”?薛承凤

① 该校校址在华山路与延安西路之间,宿舍为租赁校外房屋,分处迪化路、西康路、长乐路、东湖路四地,仅能住寄宿学生 800 人,条件较差,且距学校较远。《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概况》(1951 年)。学生会对于宿舍房小人多、卫生条件差意见很大。《意见表(华东交专学生会提)》(1951 年)。

没有从学生素质方面寻找原因,^①而是将问题政治化。共和国创建之初,大学英文水平就与“特权”“买办”和培养对象等方向性问题联系在一起;^②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尤其是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教学中使用英文,已成为抗拒思想改造和学习苏联的政治立场问题。^③薛承凤应该很熟悉这些报刊登载的运动话语,并能够对照自己所在学校的问题进行批评。

应该说,在什么运动说什么话以表示积极参与,利用直接投书中

- ① 共和国初期,由于高等教育发展过快,造成严重的生源质量下降问题。1953年2月10日,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华北区各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上讲,1952年“录取的大学生有不少的人只考二十分,入学以后有相当数量的学生跟不上班”。3月13日,马叙伦在政务院第170次政务会议上的《关于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中称,1952年“全部高中毕业生尚不足大学招生名额,因而差不多是全部包下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辑)(1953年1至12月),内部文件,1954年6月印行,第2、105页。
- ② 以《观察》杂志文章为例,萧凤在《记一九五〇年度新中国教育工作的重点》中称:“老区贫农出身的青年没念过英文,目前大学偏考英文的考试制度便对他们关了门,结果,还是有钱的能按部就班念书的子弟占了便宜。”《观察》第6卷第10期(1950年3月16日)。黄开楠在《一个工学院学生对于工学院教学的几点意见》中称:“在旧社会里,一般教授常以抄洋文笔记或口诵洋文以炫耀自己的‘学问’。”“另一种买办型的教授,更借洋文作保护,自己弄不清楚的地方,就讲了一套洋文名词,一混了之。”《观察》第6卷第10期(1950年3月16日)。
- ③ 以《人民日报》文章为例,华北大学工学院通讯组在批判中揭发:“许多教授希望把研究心得写成文章寄到外国(特别是美国)去发表,他们认为在本国发表是‘不够劲’的;讲课时用英语,或夹杂着英语,有的教授从来没有在黑板上写过中文。”《我们学生诚恳希望教师们大胆地揭发工作中的缺点》,《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1日第6版。清华大学机械系教授张维在思想反省中说:“一直到最近,我们所用的课本大部分还是英文的。”《我看到的清华大学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1951年11月23日第3版。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周培源从思想根源上深挖:“中国的旧知识分子直接或间接地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许多大知识分子都是留洋学生,受资本主义国家教育的影响,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教育的影响特别深,不自觉地以为过去学得的一套是天经地义,不愿意放弃,甚至在大学里讲书都要用英文,也不肯虚心学习社会主义国家的先进经验。”《从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谈肃清崇美思想》,《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日第4版。

央党报的行为而获取重视并出名,都是群众运动中普通群众惯常使用的手法。不过,“读者来信”还夹杂着一些个人意愿的诉求。来信批评了学校行政方面对学生要求转学、退学“不加过问”的官僚主义表现,但是,转学、退学为什么在作者那里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呢?就部分学生而言,进入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也许是受到学校宣传的诱惑,但更多的是一种无法进入名牌学校的屈就,带有观望心理,或希望以此作为跳板,使用转学而非重新考试的办法达到目标。当受挫时,就有可能采用自行退学的做法。对于新型学校,学生是根据部门需要有计划地招入,完全享受公费待遇,无特殊原因,学生并无自由选择的权利,尤其是转科系、转校。所以,要求纠正此问题上的官僚主义也不是批评的主要目的,薛承凤来信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想借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将学校并入上海交通大学,还美其名曰能获“节省国家教育经费”和“集中力量办好专科教育”的双重好处,批评主要是为取消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提供合理性。

在重大政治运动发起之时,《人民日报》选登这样一封事实模糊且充斥运动话语、外表义正辞严^①但暗含个人利益诉求的“读者来信”,作为带有导向性的运动宣传的一部分,不但暴露了复合群众运动宣传的困境,也增加了运动过程的复杂性及传奇色彩。

三 基层组织掌控的运动及高层干预

在大规模群众运动中突然遭到批评,更何况批评来源是中央党报,批评内容与自我评价距离较大,又想干脆取消学校,强势领导立即做出强势反应,以求挽回影响。

作为学校领导人,黄逸峰的第一反应就是利用组织资源回击批

① 在“黄逸峰事件”被揭露后,薛承凤在批判中又为写信行为补充了先天的阶级感情和党的教育两大动机。薛承凤:《我衷心感到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人民日报》1953年3月19日第3版。

评,一方面强调组织纪律,要求学校的一切事务都应在组织原则之下进行,“报道学校情况必须经校长批准”;^①一方面进行组织动员,发动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回应批评并展开斗争。显然,黄逸峰不满薛承凤不顾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而直接投书中央党报的行为。

1951年12月8日晚,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召开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为学生投书行为定性并进行组织动员。为统一思想认识,会前先行召开了团支书会议进行吹风和布置,要求各班级团支部必须派代表在会上表态。黄逸峰及公路局局长程飞白(交通部党组成员)参加了会议,黄逸峰作了关于《人民日报》登载学校情况的报告,与会者一致斥责写稿者“破坏校誉”“诽谤学校”,是“破坏分子”。紧接着,组织动员迅速在学生和教职员中展开,范围扩大到学校的全体成员。在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之后的半个多月内,以青年团、学生会、工会^②等群众组织名义及在各班级学生中,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讨论与批判“读者来信”的内容,指责《人民日报》发表“捏造事实”的来信是“荒谬报道”,要求团员站稳立场、带头批判,并布置追查投稿人,在各班级中号召投稿者自动坦白检讨。在学生执委的团员会议上,校领导更是号召学生“自己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这是学生自己的事”,试图将写信者树立为学生的对立面,以运动的强大声势造成现实中的人心所向和斗争界线。

群众组织冲在运动的前面,以有组织的群体行为体现斗争的群众性,党政组织则作为坚强的保障,是群众运动发动初期基层运动的常

① 《严明党纪,坚决肃清不忠诚老实与压制批评的恶行》,《解放日报》1953年1月19日第1版。由于已开放的档案缺乏“事件”过程的材料,对于过程的描述,只能多借助“事件”被揭露后的批判性报道,通过认真解读,仍能够基本说明本文所想讨论的一些问题。

② 当时学校工会只是一个临时的空架子,直到1953年5月,学校还设想“把工会组织建立起来后,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通过工会具体组织与领导”教职员的政治学习。《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政治辅导处关于政治理论学习的报告》(1953年5月28日),上海市档案馆藏,A26-2-218-68。

态。在明确事件性质和划清斗争界线之后，基层运动主要围绕集体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清查写稿人和召开思想改造大会几项活动开展。

学生的联名更正信由学生会牵头，并经华东交通部审查后发出；教职员工的联名更正信则由工会牵头，校行政与党、团负责人均以工会会员身份参加签名。《人民日报》接到更正信后，去信征求学校党支部意见，1952年1月7日，校方复函表示同意学生会及工会的声明。必须指出，由学生会、工会牵头签名连署的行为，与薛承凤来信署名“一群学生”一样，也是在宣示自己是民意或公论的代表，不过，“更正信”确实符合组织程序，使用真实姓名集体连署，也似乎更能代表群众意愿或接近“事实”，至少合于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但是，《人民日报》的反应却非基层“民意”所能掌控，2月间，《人民日报》给“读者来信”作者回了信，却未正面回应学校要求更正的强烈诉求。《人民日报》回信写了些什么？在以后的批判运动中也未曾提及，可能还是在向来信作者求证到底事实如何，不过，有一点十分清楚，那就是正值“三反”运动高潮，《人民日报》不能轻易出来进行自我更正，以免遭致可能出现的运动宣传损害。

其他两项工作都按基层组织的掌控进行。《人民日报》回信自然被校方获知，经过暗中侦察，发现信件被薛承凤取去。3月间，在强大的组织压力和紧张的运动氛围下，薛承凤不得不向校方承认《人民日报》发表的“读者来信”为他所写，并被校方责令检讨。斗争对象一旦明确，4月16日，学校召开了思想改造大会。依据群众运动惯例，会议经过了严密的组织布置。会前，对会议形式、程序和内容进行了细致的准备，“召开小型会议进行具体布置，并拟定了详细提纲和口号，以至什么时候呼口号几分钟，对那个人呼什么口号，均有规定”。会议选择了8个所谓落后同学，分成三类典型，作为斗争对象，群众则以争取、冷落、愤怒三种态度对待，象征错误的程度和适用不同的政策。薛承凤被列入“恶劣”一类，当其上台检讨时，台下群众“呼愤怒的口号”，

提要求开除的纸条,而且“越多越好”。^①最后,由黄逸峰出来讲话,严厉批评薛承凤的行为,同时表示要继续对其加以“改造”。其实,思想改造大会原本包含组织处理的内容,只是校方开除薛承凤的意见未能得到华东教育部的批准。薛承凤由于在同学中遭到孤立,曾一度想退学,校方便要他写申请书自动退学,但薛不肯离校。四五月间,校方曾两次函告薛承凤家长,称薛“旧病复发”“神经失常”,请来将其领回,或来信委托该校请福建交通厅派人伴送回籍。

此外,校方还通过倡导革命传统和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回应所谓有损学校声誉的批评。校方重申必须用“革命的办法来办学校的方针”,“因陋就简”“逐步完备”“人才速成,课程精简”是办学的基本方法,并强调应“确立‘政治思想教育第一’的观念”和开设全校性政治大课的重要性,“以期更进一步提高同学的政治认识,树立正确的学习观点”。^②想要跟“老革命”玩“政治挂帅”,刚入学的青年学生明显稚嫩了许多。

与此同时,黄逸峰正领导着华东交通部门的“三反”运动,而且是上海市“三反”运动的先进,并不只是一个消极应对批评的领导者。据报刊记载,1952年2月3日,华东交通部“举行坦白检举大会,进一步动员群众围剿大贪污分子”,^③黄逸峰在会上向贪污分子发出坦白交代的最后通牒,走在上海市“打虎”阶段的前列。^④3月16日,华东交通部举行围剿贪污分子大会,作战总指挥黄逸峰发出二次攻击命令,大会从上午8时起一直开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采取了“大会套小会”方式,前后开了三次大会,两次小会,小会又分成44个“正规战场”和100多个“游击战场”,“在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以严密的组织,集中的火力,向一切贪污分子穷追猛打”。并决定以19日为坦白交代的最

① 张以达:《反党分子黄逸峰等是怎样布置我们斗争薛承凤的》,《解放日报》1952年2月1日第2版读者来信栏。

②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是怎样办起来的》。

③ 《动员群众围剿“大老虎”》,《文汇报》1952年2月8日第1版。

④ 1952年2月11日,上海市委方才对“打虎”组织、“打虎”预算做出具体安排。《“三反”运动研究》,第37页。

后期限。^① 3月20日,华东交通部召开“宣布宽大贪污分子大会”,黄逸峰在会上反复说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② 可见,黄逸峰对于群众运动的掌控相当熟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至少后两次大会的会场都设在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大礼堂的重要性一目了然。

事件发展至此,似乎基层单位的运动都在严密的组织掌控之中。但是,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波涛之中,黄逸峰也非十足的强势,其位置可能随运动进程发生一定的移动。对于“三反”运动的发动,中央要求“由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发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按级相互检查”,^③并将“各单位的首长们能否以身作则,带头检讨”^④作为运动发展和深入的关键。华东局亦要求“负责干部首先以身作则,在党组会议、支部大会上进行自我检讨,发动民主检查”。^⑤ 如此,各单位、各部门的领导干部都被推上了运动火线,具有了双重身份或角色,即一方面要领导本单位、本部门的群众运动,一方面要带头公开自我检讨并接受群众检查,为下级或普通群众提供了发表意见的机会。事实上,黄逸峰就因为没有经过党内发扬民主的程序,只是在群众动员大会上附带检讨,并将运动迅速转向反贪污斗争,遭到下级干部质疑,^⑥某种

① 《华东交通部围剿贪污分子》,《新民晚报》1952年3月18日第4版。

② 《华东交通部开会宣布宽大处理贪污分子一批,得到宽大的贪污分子都衷心感恩图报》,《新民晚报》1952年3月22日第4版。

③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84页。

④ 薄一波:《为深入地普遍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1952年1月9日),《薄一波文选(一九三七——一九九二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75页。

⑤ 《华东区一级机关党员负责干部带头检讨》,《人民日报》1952年1月14日第1版。

⑥ 李学民认为华东交通部反官僚主义和领导检讨不彻底,群众不满,黄逸峰在该部中共党组织扩大会议上斥责李等破坏他的“名誉”,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并撤销李学民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共党代表会议代表资格。此事被作为揭露黄逸峰时的重要错误。李学民:《揭发黄逸峰压制批评打击干部的恶行》(1952年12月9日),《解放日报》1953年1月20日第3版党的生活栏。

程度上也是事件升级和批判斗争的因素之一。

在“三反”运动中,反贪污、反浪费的成绩突出,领导机关和舆论宣传也就更加需要反官僚主义的典型,以营造群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氛围。除刘青山、张子善等大案要案的有选择报道之外,报纸公开批评主要围绕“压制批评”的官僚主义行为而展开。^①在华东局及中共上海市委首批被点名公开处理的高级干部中,黎玉、顾准等被指为“一贯的家长作风和严重的官僚主义,滥用职权、擅作威福”和“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屡经教育,毫无改进”,被定性为“恶劣分子”。^②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和公开报道及讨论,无疑都会给领导者造成某种压力,并鼓励群众起来积极检举、揭发“三害”,更何况“纪凯夫案”“张顺有案”均以群众来信来访形式为开端。

另一方面,1952年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和院系调整工作,也不利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摆脱发展困境和稳定局面。

6月1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规定除特别批准外,一律参加统一招生,采取短期速成与长期培养统筹兼顾而以大量举办专修科为主的方针,计划招生增至

① 以《人民日报》相关报道为例,1952年2月26日,发表社论《把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清除出去》,宣布了对于“纪凯夫案”的处理,指责蓄意打击报复向毛主席写控告信的武汉市立第二医院文书、青年团员纪凯夫者为“潜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坏分子”。《人民日报》1952年2月26日第1版。社论发表后,在报纸上进行了一系列批判和讨论。5月30日,发表《必须肃清官僚主义》的评论,同时报道了赶车工人张顺有因检举反革命分子遭遇官僚主义重重阻碍的事件及华北局的态度,强调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如不彻底铲除,“就等于放弃了革命”。《人民日报》1952年5月30日第3版政法工作简评栏。此后,又发表了一些读者来信及讨论。

② 《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人民日报》1952年3月4日第1版。被撤职前黎玉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和市政建设委员会主任等兼职;被撤职前顾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等职。

5万人,并硬性规定录取后不得要求转院转系(或科)及转校。^①由于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仅3.7万人,又采用从部队及机关抽调大批干部进行补习后报考的办法,实际录取则大大突破了计划指标。^②同时,教育部指示“运用革命的精神和办法,发扬创造精神,精打细算,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学校修建设备,必须“采取因陋就简、增班为主、建校为辅、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校舍”的办法。^③10月13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高等工业院校制定教学计划的指示》,在附发的专修科教学计划(草案)中规定,专修科的任务是培养高级技术员,修业年限为二年。^④此前,专修科培养方向并无确切规定,为争取和稳定生源,专科学校多将培养工程师作为招生宣传及开展学生工作的内容。^⑤

在充满矛盾的高速发展中,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加快了步伐。8月,华东地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委员会成立,标志着院系调整由协商制订方案阶段进入实施阶段。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在暑期的调整中,二年制土木工程科并入同济大学,机械工程科并入交通大学,学制改为五年一贯制及一年制(干训班)两种,又并入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及

①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8—59页。内称“实际录取新生七万九千人”。

② 较早估计的高中毕业生数字为“全国高级中学毕业生只有三万六千名”,当时公布的录取数字为“全国共录取了新生六万五千八百九十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1951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1952年4月16日第1版;《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工作顺利完成》,《人民日报》1952年9月26日第1版。

③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人民日报》1952年7月21日第1版。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第66—67页。

⑤ “黄逸峰事件”揭露后,学校文件中提到:“黄逸峰为了维系学生,曾说交大是万金油,我们是专科,你们在交专毕业后都是专家、工程师,使学生对培养成专家、工程师的印象很深。”《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整顿工作报告》(1953年5月2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A26-2-199。

大公职业学校学生 370 多人,学生质量下降^①而人数反升,有五年制学生 1012 人,一年制学生 456 人,共计 1468 人,设备、师资的缺口进一步扩大,只能临时租赁房屋充作校舍。^②

在遭遇思想改造大会斗争及学生中的孤立后,薛承凤只得再次投书《人民日报》。此时,《人民日报》的处理方式令人回味。6月8日,报纸刊登了早在1月间就已收到的校方对薛承凤批评信件的答复,^③但只选择了其中的解释性内容,要求更正的部分被删去。薛承凤的再次来信,则被转给了华东局办公厅。也许,《人民日报》经过核实情况后,以为问题并不严重,在报刊上登载校方答复后,^④将问题推给地方处理;也许是感到事件过于复杂,非报纸施加舆论压力所能控制,从而要求地方及部门主管机关采取组织措施。“读者来信”的内容是否真实,此时已不重要,《人民日报》没有必要加以更正,宣传导向是对报纸批评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其实,“读者来信”风波此时在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日常生活中也已不重要,学校正为新的分割、合并和招生工作忙得不可开交,薛承凤也即将转而成为交通大学的学生,基本上达到了写信的目标。可是,群众运动的进程,往往与基层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时空距离,随着上级组织的全面介入,运动中的角色位置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8月1日,由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主持及有关各部门共同组成的检查组前往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检查,学校领导立刻变成了被调查

① 校方认为新并来的学生、教师问题较多,“两月来曾数次发生学生打人闹事,不守纪律等事件,因薛承凤问题的影响,少数不正确的及与薛有关学生进行鼓动,最近竟发生机械科几个班级的少数学生在学习时间,组织开会哄闹,结成小集团,拒绝教员上课等严重问题。”校方准备进行“彻底端正学校风纪”的整顿。《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关于送上整理校纪与端正学习态度计划草案》(1953年1月5日),上海市档案馆藏,A26-2-199。该文件在批判黄逸峰运动中,也被指是为打击报复而捏造的文件之一。

②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工作总结(1951年8月至1952年12月)》。

③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对读者批评的答复》,《人民日报》1952年6月8日第2版对《人民日报》读者批评建议的反应栏。

④ 《人民日报》事后检讨编辑部由于轻信学校的“证明”而发表了“显然是伪造事实的答复”。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人民日报》1953年1月23日第1版。

者,展开了一系列复杂的群众运动中的组织攻防。作为学校主要领导,黄逸峰等人认为“检查组是带有‘张顺有事件’‘纪凯夫事件’的框子去学校找典型”,^①要求学校干部及党团员“统一认识”、一致口径;检查组则通过启发教育及座谈、讨论,^②寻求组织内部的突破。在群众运动中,上级组织往往具备更大的权威性,基层干部很难独立选择立场,而且,上级检查也提供了发泄不满的机会。于是,学校干部队伍开始分化,部分人采取了与检查组合作的态度,其结果直接影响学校日常工作的开展,也影响到学生的情绪和行为。^③学校日常工作的混乱,又被作为黄逸峰抗拒批评,试图转移斗争方向的证据。

检查组调查报告形成后,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9月25日和10月16日两次举行会议,对黄逸峰等人进行批评教育,并拟定了给予黄逸峰党内警告处分的组织结论。^④在此种情况下,其他当事人就各自责任进行了检讨,黄逸峰却拒绝公开检讨,也不听从他人劝告主动找谭震林反映情况,检讨缺点和错误。于是,华东局派组织部负责人赴京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处理意见。当毛泽东得知黄逸峰压制批评的情况后,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压制批评,轻则开除党籍,重则交人民公审”的批示,^⑤“黄逸峰事件”被最后定性。

① 《揭发反党分子黄逸峰的真面目》,《解放日报》1953年1月21日第1版。

② 《严明党纪,坚决肃清不忠诚老实与压制批评的恶行》,《解放日报》1953年1月19日第1版。

③ 在揭发材料中,首先站出来反映情况的干部或是新调来不久的干部,或被指“带有个人的成见”。黄逸峰称工作组到校后,学校已不向他们反映情况,耽误了基建工作。黄在给华东教育部的情况报告中称有学生说:“薛承凤搞了一下,学校搞乱了,我要组织薛承凤第二集团,再搞一下,学校就完了。”《揭发反党分子黄逸峰的真面目》,《解放日报》1953年1月21日第1、2版。

④ 《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第89页。

⑤ 林蕴晖:《“黄逸峰事件”与一篇重要文献》,《北京日报》2006年8月21日第17版。这一说法被广泛使用,均未注明确切出处,实为1952年10月24日,毛泽东就10月18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党纪案件的经验和今后开展纪律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所作的批语,该报告提出开展群众性纪律检查运动,重点处理对党员和群众来信“不予处理、敷衍了事和压制民主、报复控告人的行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598—599页。

此种结果,是由于黄逸峰“个性倔强”或“居功自傲”所招致?还是由于华东局乃至中央需要抓一个反官僚主义的典型?或许两方面的因素均有。但是,既往研究多忽略了群众运动中组织内部不同层级对运动的理解、应对及目标选择差异。黄逸峰始终坚持群众参与应是有组织的行动,批评首先要求内容的真实,这些都是党的基本原则和经验,只不过在群众运动中,尤其是在发动阶段,往往更偏重于鼓励自下而上的自发行为,运动中的宣传舆论导向也往往更注重态度、立场、声势,而非学究式的考证。在已被最高层定性后,1953年1月5日,黄逸峰在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党课上还专门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强调“批评的态度一定要老老实实,诚诚恳恳”“批评要在一定会议中”“要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提出,并天真地质问:“如某机关因一读者批评同事事实不符,职工集体签名要求改正,是否叫做反抗党报?”^①

四 精心组织的大批判

1953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强调:“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要求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展开坚决的“新三反”斗争。“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②新的运动,需要新的斗争对象和典型事例。

1月13日,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以黄逸峰犯有“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的反党恶行”和在党检查处理过程中又犯有“严重的欺上

^① 《揭发反党分子黄逸峰的真面目》,《解放日报》1953年1月21日第2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8—10页。

瞒下、目无组织、对党极不忠实的错误”，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①并建议撤销其一切行政职务。1月15日，华东局决定撤销中共华东交通部党组，^②标志着黄逸峰经营的所谓“独立王国”的结束。于是，运动完全回到了统一认识、统一行动的严密的组织控制之中。

“黄逸峰事件”的揭露，被视为华东地区反官僚主义的重大胜利，《解放日报》精心组织了公开的批判运动，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和广大读者都应当采取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态度，积极反映和报道有关这一问题的材料”。^③为此，编辑部制订了详细的报道计划^④，根据运动的阶段划分，以及各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分三个步骤实施。报道计划充分展示了发动一场群众运动的宣传策略，抓住典型事件，以组织定性为依据，展开有计划、有组织、全方位的宣传攻势，其中既有各省市、各部门领导机关及主要负责人的表态，也有普通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强烈声讨；既有所谓揭露事实真相的检举、揭发，也有从问题根源深刻批判的理论文章；既有曾因批评遭受打击者的控诉和曾犯有打击报复错误者的检讨，也有干部、群众经过斗争、学习收获的认识和感想，对运动各阶段的宣传内容都有具体布置，以收取逐步深入、全程引导之功效。

第一步，主要工作是“公布黄逸峰事件的真相，宣传党的态度与决心，使人人痛恨这类反党的罪恶行为，为召开审判大会做好思想准备”。依计划列出了需要发表的材料，尤其是前三天报纸报道的详细内容。第一天刊发开除黄逸峰党籍的新闻、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处理决定和本报社论，以及事件的一些背景材料，为批判运动定调。

① 《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的处分决定》（1953年1月13日），《解放日报》1953年1月19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撤销中共华东交通部党组的决定》（1953年1月15日），《解放日报》1953年1月20日第1版。

③ 解放日报编辑部：《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事件”的报道提示》（1月14日），上海市档案馆藏，A73-1-130-3。

④ 《解放日报社编辑部关于黄逸峰事件的报道计划》（1953年1月），上海市档案馆藏，A73-1-130-1。

第二天刊发华东局撤销华东交通部党组的决定和交通部干部的检举材料,以及交通部、交通专科学校的反应,以单位、部门的揭发、批判充当批判运动的民意基础。第三天以记者专访处理此案的有关负责人的形式,公开揭露黄逸峰一连串“反党活动”的事实。从第四天起,连续发表有关人员及党组织的检讨和补充揭发材料,报道重点逐步转向发表有关人员的感想和一些党员、党组织对此事件的反应与处理意见,为必须召开审判大会营造气氛。其间,也会选登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文章和领导干部讲话,为批判提供理论武器和斗争方法。

第二步预设目标是“报道审判大会,组织与发表广泛的反应,使这一斗争全面展开”。计划报道审判大会新闻及需要公布的讲话原文和会后各方反应。由于进入运动高潮,报道面扩大,不但要“吸收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投入战斗,表明自己态度,拥护党的正确决定”,尤其是“召集过去曾经展开批评或曾经因批评而遭受压制、打击的党报通讯员举行座谈会”,联系个人经历,批判、揭发压制批评的反党行为;而且“要过去有类似错误的人,以此事件联系自己进行思想批判”,除在报纸上树立一两个代表人物外,对于问题不大又能自动深刻检讨者,不报上点名。对于过去有类似错误仍不自觉悔悟者,则进行揭发、批判。但是,是否应在报纸上公开点名,《解放日报》采取了谨慎态度,对于问题不很严重尚不需纪律处分者,采取由综合通讯员意见加以点名的办法,要其公开检讨;对于问题较严重而态度恶劣者,可由被压制批评的人在报纸上公开声讨,由报社要求其上级领导机关督促处理,但又规定,“除情节特殊严重作为典型事件者外,一般可迟一步”。基本采用了《人民日报》处理“黄逸峰事件”的模式。

第三步则为配合运动的总结、善后阶段,计划“结合各地的学习,组织一些水平较高的同志发表文章”,拟定了12个要发表的文章题目,内容覆盖“压制批评者为什么是党的死敌”“驳斥各种压制批评的荒谬论调”“分析黄逸峰错误思想的本质”等各个方面,在约请写文章的名单中,囊括了华东地区各省市、各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

检索《解放日报》在批判运动中的发表情况可以发现,第一步的宣传报道依照计划顺利完成。自1月19日起,报纸连续刊载华东局对

“黄逸峰事件”的组织处理决定,并发表相关社论,^①以及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和相关当事人的检举揭发材料,成为批判运动的基本事实和斗争性质的依据。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以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给黄逸峰戴上了“党的死敌”的“反党”帽子,并指出“黄逸峰事件”暴露出国民党的官僚主义和恶霸作风的遗留与影响、把所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王国和把所管理的国家财产当作私产、借历史和地位向党闹特殊性等三个问题,^②为批判运动定了调子。1月26日,《解放日报》在第1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同时继续刊登各种表示坚决拥护的来信,标志着高潮到来的条件已经成熟。

不过,由于最高层改变了处理办法,黄逸峰并未依原设想的那样作为“党的死敌”被审判,^③计划中居于报道高潮的审判大会也就未能举行。当然,此种变化,非华东局及《解放日报》所能预料,但运动仍要继续。于是,报纸宣传的口径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要求召开审判大会的民意,改为由华东交通部党总支及各单位党组织、各地读者来信强烈要求召开大会,彻底批判黄逸峰的错误思想并清算其罪恶,^④

① 社论:《严惩压制民主,欺骗组织的坏蛋份子,为提高党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战斗力而斗争》,《解放日报》1953年1月19日第1版。

② 《人民日报》1953年1月23日第1版。

③ 《解放日报》为华东局机关报,改变计划的决定应来自更高层。姜铎撰写的黄逸峰传记这样记载:“这一事件发生时,对黄逸峰较为熟悉的刘少奇、陈毅都去苏联出席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当陈毅回国后得悉这一情况后,这位领导过黄逸峰多年、对他比较了解的‘老总’,曾作过改变对他的处分的努力,但结论已定,并经公布于世,已是无法改变了。”“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到可以允许黄逸峰重新入党的问题。于是,中共上海市委着手帮助黄解决重新入党的问题,同年年底办妥一应手续。”《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第91页。

④ 《很多单位中党的组织投函本报,一致要求上级党委召开大会,彻底批判黄逸峰的反党思想》,《解放日报》1953年1月25日第3版党的生活栏;《中共华东交通部总支等继续来信,要求召开大会批判黄逸峰的错误思想》,《解放日报》1953年1月27日第3版党的生活栏;《华东各地读者继续踊跃来信,要求召开大会彻底清算党的死敌黄逸峰的罪恶》,《解放日报》1953年1月29日第1版。

华东局则接受群众意见,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交通部总支党员大会。^①随后,报纸上公开批判的规模有所降低,原计划发表的高水平理论批判文章出现了明显的缩水现象,同时,报纸内部开始检讨报道中不调查、不核实、不请示的错误。^②

在“黄逸峰事件”发生的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批判运动完全依照上级计划和斗争经验进行,有热烈拥护、积极揭发、诚恳检讨、愤怒控诉等各种表现,十分热闹,较之前期黄逸峰领导下的运动,更能体现群众运动参与方式的特征。

由于事实已被认定,有组织的大批判更注重态度和立场,新揭发出来的一些“事实”,也只是批判的注脚。于是,黄逸峰需要为学校存在的各种问题承担全部责任,甚至华东地区涉及交通的各种问题都会同黄的官僚主义相联系。^③在学校干部中间,原与黄逸峰关系较远者,明确表示衷心拥护;^④关系较近但较早反戈一击者,检讨自己未能积极开展批评是“存在着浓厚的个人主义情绪”;^⑤关系密切且受影响较深者,则痛陈自己受到“欺骗”并积极揭发黄“反党”的“具体事实”;共同的感觉是“压在我们身上的一块大石头搬掉了,我们从心底里体

-
- ① 《华东局接受党内外群众要求,召开交通部总支党员大会,揭发批判黄逸峰反党恶行》,《解放日报》1953年1月31日第1版。
- ② 批判运动高潮紧随自我检查,张春桥以为,1953年《解放日报》已发表的130多件稿子中1/3以上有事实出入,还不包括读者来信。王晓梅:《建国初期党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探析——以〈解放日报〉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 ③ 黄逸峰被揭露时,恰逢春节回乡高峰时期,许多人因买不到火车轮船票,“甚至怀疑是否铁路、交通部门又犯了官僚主义”。报纸的回答,将主要原因归之于春节回乡多、经济发展快和美蒋的破坏,官僚主义者只是极少数,以消除人们对政府及国营部门的误解。《为什么买不到火车轮船票?》,《新民晚报》1953年2月7日第1版。
- ④ 周迈:《衷心拥护华东局开除黄逸峰党籍的英明决定》,《解放日报》1953年1月26日第3版。
- ⑤ 印建强:《诚恳接受党给我的处分》,《解放日报》1953年1月23日第3版党的生活栏。

验到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① 学生中间也是如此。原服从学校领导的团员检讨说：“过去我们只相信错误的领导，不相信群众，反而责怪群众落后。有意见也不敢提。”一般同学将学校问题归因为：“过去，我们对领导上从来不敢提意见，学习松弛，纪律很坏，竟没有人管。”过去对学校不满，想转学的同学，这次也安心了。对学校前途缺乏信心的同学吐出了豪言壮语：“学校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专业是伟大的，今后得好好加油干。”^②群众运动中的政治话语，使用得更加熟练。

至3月上旬，学校的反黄逸峰思想运动宣告“胜利结束”，斗争的收获据称“非常巨大”，主要表现在：“一、彻底解散了黄逸峰的‘独立王国’，维护了党和国家的统一，纯洁了党的队伍，改造和巩固了党的组织，加强与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二、提高了党内外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加强了党内的民主生活。”“三、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内外和上下级之间的团结，提高了广大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革命自觉性。”^③表面上看，似乎学校的前景一片光明，可是，除了组织清理之外，运动并没有带来什么具体的变化。

五 整顿纪律与新型学校的终结

“搬石头”确实具有释放群众参与热情的功能，但运动一经发动，很快便超出了学校领导可能控制的范围。对于黄逸峰压制民主、压制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和交通部全体人员热烈拥护华东局清洗黄逸峰出党》，《解放日报》1953年1月20日第1版。

②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和华东交通部全体人员热烈拥护华东局清洗黄逸峰出党的决定》，《文汇报》1953年1月21日第1版。

③ 《前华东交通部各单位及交通专科学校清算黄逸峰罪行的斗争有很大收获，目前正在结合经常工作深入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解放日报》1953年4月24日第3版。

批评错误行为的揭发、批判,很快转变为对学校党、团干部的普遍揭发、批评,斗争锋芒指向“组长以上党员干部及与群众直接接触的某些作风较不好的辅导干事、教师,以至班级学生干部”,要求下班检讨,而且,同样采用了对被批判者“扣帽子”“斗争”的方式。结果一批原有骨干被斗,“使他们怀疑新的领导对他们是否信任,没有信心亦不愿意再去担任工作,这就使领导上失掉了在群众中依靠的核心力量,瘫痪了下层组织基础。”对于盲目服从错误领导的批判,也产生了一些副作用。学生中增加了对领导的怀疑心理,因怕“受骗”而不积极地响应上级号召,特别是当与个人利益有违背时就“坚决不服从”,“团员跟着落后学生盲动的现象亦多了,给今后领导工作增加了困难”。^① 群众运动的参与方式,不但无法顺利达成预设目标,反而加剧了学校中原本存在的紧张关系,造成组织凝聚力和领导威信下降,使得批评和自我批评更难以正常开展。

更令各级领导始料不及的是,薛承凤由一个遭受打击、迫害的被斗争对象转变成勇于反官僚主义的斗士,而且成功转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经历,极大地鼓励了有类似期待的其他学生,并借助运动将愿望直接转变为积极的行动。批判运动并没有解决希望转学的问题,反有更多的学生直接提出要求,一语不合,便向上级及党报写信控诉。一名五年制管理科二年级学生写信给华东教育部,揭发、控诉反党分子黄逸峰,称其因身体不好、学习跟不上、遭同学嘲笑和受到孤立,要求转学医科,受到学校行政“不负责任”的对待,并称此举已“使我对政府也产生了不满意”。^② 明显是将所谓“不负责任”上纲为破坏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的官僚主义。

影响较大的是已分配到华东公路管理局直属第一工程大队的一年制同学的集体请愿,要求保送进入大学继续学习。他们的要求,也代表了一年制部分已留校或已分配到其他单位工作的同学的意愿,一

①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整顿工作报告》(1953年5月25日)。

② 《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致华东交通专科学校》(1953年2月12日),上海市档案馆藏,Q259-2-92/93/94。

时形成较大声势。华东高等教育管理局认为,一年制训练班不属正规班级,入学时程度参差不齐,既已分配工作,不能再分配入大专学校学习。更重要的是,“这批学生为数甚多,如对这少数人予以照顾,势必引起更多的人不安心工作而来要求学习”。“也将引起其他人员援例要求学习,则我们将很被动,且无法应付。”^①中央交通部对进一步申诉的反应就更为宽缓、含糊,一方面认为这些学生工作不到两年,不合人事部规定的调干入学条件,故不能保送;一方面又同意他们自行投考学校,并要求工作单位给予一定假期温课,未经考取仍得回原单位工作。^②表现出群众运动中领导机关的谨慎。此种温和答复反鼓励了企图“搭便车”的学生,他们以为“我们的要求已经引起了领导上的重视,但是距离我们要求太远”,拒绝自由参加统招,坚持集体保送,理由是:“我们在进华东交专时,已经经过入学考试,而且在交专土木工程科已读过一年,又工作了将近一年,如仍读土木工程方面系科,根本没有考试的必要,我们进入一年级已属冤枉,若再要入学考试岂不太不合理。”^③已经近乎胡搅蛮缠。

显然,群众运动的走向是新领导不能接受的。因此,当批判运动进入高潮之时,紧随其后的并不是对旧问题的整改和争取新的发展,而是迅速转向重申秩序和整顿纪律。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方认为,揭批黄逸峰运动“偏重于发扬民主”,忽略了“较系统的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教育”,以致“产生了严重的极端民主现象”,要求“整顿纪律”“整顿校风”。^④

整顿纪律直指学生中存在的各种恶劣行为,运动对象由居功自傲的官员转为放荡不羁的学生,而且,对于学生问题的估计远比黄逸峰

① 《华东高等教育管理局高行字第 5274 号》(1953 年 4 月 16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Q259-2-92/93/94。

②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关于华东交专一年制毕业学生已分配工作请求继续学习的办理意见由》(1953 年 5 月 20 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Q259-2-92/93/94。

③ 《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关于华东交专一年制毕业学生已分配工作请求继续学习的办理意见由》附件,上海市档案馆藏, Q259-2-92/93/94。

④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整顿工作报告》(1953 年 5 月 25 日)。

任职时期更为严重,处理也更为严厉。校方声称:“少数坏学生违反纪律的现象十分严重,破坏制度,违犯课堂宿舍规则,打人骂人,破坏公物,偷窃敲诈,乱讲荒谬言语,生活腐化堕落,在校外为非作歹,扰乱社会治安。”“很多干部‘怕学生’、‘怕犯错误’,政治处与下属组织机构仍处于瘫痪状态。”在宣布整顿纪律后,每个班级仍有三五个学生满不在乎,“把校规、制度、纪律看做:‘当他是假的。’”更令人感到疑惑的是,在紧张的政治运动之中,“坏学生”的恶行居然也发展到了政治领域。学校厕所里出现了反动标语,“有的将悼念斯大林同志的黑纱戴到脚上”,“追悼大会上有的在后边打扑克牌,有的公开讲反动言论,有的背后煽动同学犯错误”。4月29日,经请示批准后学校公布将4名既违反校规又违法的学生开除学籍,其中两个由公安局抓了去,一个被判处三年劳役改造。^①可见,政治运动中的纪律整顿,较之一般行政管理整顿更为严厉。

客观而论,学校秩序的混乱,并非完全由政治运动所造成,除了原有的学制、设备、师资等因素外,最重要的是学校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前途未卜。就在黄逸峰被解职之时,学校正面临如何制订进一步调整方案的棘手问题。搬去黄逸峰并没有给学校前途带来“光明”,相反,更换新领导,以及直属上级由华东交通部改为华东教育部代管,都使得学校的前途更为混沌甚至暗淡。

贯彻调整方案的第一步是“决定结束一年制,并将民生公司训练班转出领导关系,以便集中力量办好五年制”。取消一年制,一方面是因为此种短期训练班开办较多,已经可以基本满足用人需要;一方面由于一年制学生来源最为复杂,不易管理。一年制结束后,学校还有学生1004人,设备、师资短缺稍有缓解。在此基础上,学校最初设计的方案为:甲、由二年级及部分三年级学生组建四年制公路学院,计划迁校北京。乙、学校改为上海公路学校,现有一年级学生交拨该校。丙、

^①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整顿工作报告》(1953年5月25日)。

部分三年级及四年级学生调往其他大专院校。^①2月初,华东教育部主管领导来学校主持制订调整方案,“决定将三、四年级暑假后转入其他大学,一、二年级改成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亦可升入大学。”消息传出,造成了“全校性的大风波:以二年级为主坚决反对改为中技。一年级要求并入大学的预科,二年级要求并入大学一年级,三、四年级要求并入大学二、三年级”。团员思想情绪亦十分紊乱,有的团员提出:“团籍可以不要,方案一定反对。”“管他什么党中央,要读中技我一定不服从。”甚至要挟学校新领导说:“方案不经过学生研究就报告上级是不民主,是黄逸峰。”新学期开始后,3月18日学校宣布经修补的调整方案,许愿“一、二年级亦于读满三年后转入大学专修科,校名、师生待遇不变”。学生仍然不满:“愿读本科,不愿读专修科;三、四年级要求马上转走。”^②

必须指出,新领导及新代管部门主张或倾向于放弃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时,理由与黄逸峰招致批评的理由相仿,但解释话语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黄逸峰任职期间,学校能够在短时间内因陋就简地创办,是国家建设需要并符合新型学校的构想,学制、设备、师资等所有问题,都是暂时的,都可以用革命方法和确立“政治思想教育第一”的观念加以克服。黄逸峰倒台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成了一个烫手山芋,评价标准也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校方报告中,反复强调校舍、宿舍多系临时租赁,教室小得学生挤不下,侧面同学看不见黑板那半边,前边同学靠近黑板“吃粉笔灰”,教师讲话唾沫喷到学生头上,而且,中国福利会一定要收回校舍一部办托儿所,房屋管理局想将学校租用的文工团的房子给卫生局办训练班,以便给部队调整房子,学校新建的实习工厂因靠近第六医院与华东医院,医院嫌吵并希望要去扩大业务。对于教师、学生素质的负面估计扩大,教师除数量、专业缺口较大外,且来历复杂,“其中有大汉奸、国民党的特务、官僚、政

①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整草案》(一)(1953年1月29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Q259-2-98-19。

②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整顿工作报告》(1953年5月25日)。

客”；学生中随便旷课、不关心政治的现象仍很严重，落后同学晚上逛马路、下舞厅，“并有少数‘阿飞’及个别的政治嫌疑分子”。^① 由革命论解释转为强调条件论，与中央高等教育部成立并要求努力克服过去“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②相关，是继续院系调整工作合理性的解释话语，但在政治批判运动中讲出来又多少有些不谐调。于是，黄逸峰创办学校的举动，就成为“好大喜功，不自量力，盲目发展，造成学校师资、设备太差，不够一个大专学校的最低条件”。^③ 早知今日，当初还不如不办。

处境艰难的学校领导，只得将各种调整方案罗列上报，供上级定夺，也算给了学生、教师一个交代。提出的方案共有四个：^④

第一方案：于今年暑假将华东交专全部调整掉。除按原方案将三、四年级学生转出外，将机械科一、二年级并入交通大学作为预备班，将土木科一、二年级并入厦门大学作为预备班。原运输管理科一年级以自愿原则采取个人提出志愿、领导批准的办法，分科转去以上两校。教职员统一分配到以上两校或他处工作。思想情况估计去交通大学的师生全都高兴，只是个别的怕不能再任科主任了；可能一部分人不愿离开上海或觉得苏南太远。优点是去两个较好的学校，师生积极性高，没有多大思想阻力，较容易贯彻实行。又称土木科师生如去同济大学，则更容易贯彻。

第二方案：筹办公路学院，但需以外力为主，交专教职员只能作为学院的一部分力量。思想情况估计全校师生员工是高兴的，学生三、四年级漠不关心，二年级要求迅速加强筹设，一、二年级少数不愿做公路方面工作的希望能转到其他大学去。优点是解决了交专的前途问题，学生动荡小，教职员赞成，有利于方案的贯彻。但任务增大，需要从南京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几个学校抽调师资

①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整顿工作报告》（1953年5月25日）。

② 《中央高等教育部举行成立大会》，《人民日报》1952年12月28日第1版。

③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整顿工作报告》（1953年5月25日）。

④ 《关于调整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几个初步方案》（代理校长张永逊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A26-2-199。

100人,基本建设工作紧张,需今年搞好全部设计及材料购置合同、包建合同、详细预算等工作,准备明年春开始动工兴建,明年建立起主要部分,寒假搬家。故领导上须大力支持。

第三方案:将交专改为“交通大学、同济大学联合预备班”,到1955年结束。思想情况估计教员学生都满意,但有部分留下来的教职员会有“临时观点”思想。优点是不增加其他大学的负担,但缺点较多,尤其是修建工作会造成很大浪费和整顿学风不如前面两个方案有力。所以这一方案不大解决问题。

第四方案:调整成中等技术学校。“降成中技”会受到很大阻力,教员多数因实际经验少,并不适合做中技教员,有的则完全不适合,必须调整出去,搞1500名学生的规模,就需要调70人来,其中要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行政力量亦要调整加强。缺点很多,拟不采用。

十分清楚,学校领导中意的是最省事且阻力最小的方案。结果,上级领导接受了“全部调整掉”的一劳永逸方案,可见也想尽快甩掉这个包袱,不过,学生及教职员工的去向却远不如原设想。暑假期间,在先行集中力量解决三、四年级的调整之后,于8月14日和27日分两批宣布了调整方案,并结合整顿学风,根据学业成绩,进行了一次清理,全校1002人中共退学18人、降级1人、留级74人。随后,立即组织师生离校,除因退学、休学和毕业生外,共有975人被调整到各学校,计调至苏南工业专科学校412人,华东纺织工学院108人,青岛工学院114人,北京铁道学院31人,浙江大学172人,南京工学院73人,山东工学院65人。^①学校新领导本该肩负起大批判推动大发展的使命,却以学校终结者的身份,在送走学生、教师之后,坚持完成了调拨校产,结束财务、卷宗,并逐步将职员分配走等最后的校务工作。

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终结,自然是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结果,但与“黄逸峰事件”又不无关系,至少与其终结的方式有一定联系。以华东交通部的实力,如果再加上中央交通部的积极争取,在当时办一所

^①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整结束工作的总结报告》(1953年12月),上海市档案馆藏,A26-2-199。

由业务部门领导为主的公路学院并非没有可能。^① 随着黄逸峰的倒台,比较同期因“条件太差,而一时又难于加强,不宜单独继续办下去”而被“予以撤销或归并”的其他专科学校,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被分割得最为破碎、最为彻底,^②甚至连一点儿前身的影子也难寻觅。^③

学生虽然转到了各大专院校,但所去学校不一定理想,除去北京31人外,其余被分散在华东局所属各省,绝大多数离开了上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政治运动中获取一定强势的学生,在院系调整中也未能满足初衷。尽管存在一些不满情绪,离校工作却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也要归因于政治运动中整顿纪律的强大压力。校方总结称:“由于全校学生都不满意交专的现有条件,并有一定的思想准备,故对学校调整均表满意。”^④真乃树倒猢猻散,令人感喟不已。

六 余论:群众运动参与方式的内在冲突性

本文讲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复合群众运动环境下的故事,尽管有

- ① 当时中央曾考虑将黄逸峰“调到中央交通部去担任副部长的职务”。见《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第89页。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显然不是一位强势领导,从有关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档案看,章伯钧在涉及学校事务的批示上,多取尽量回避直接干预的态度。再者,在由业务部门主管的工科院校中,特别是与交通有关的各院校中,当时已有铁道、航空、海运、河运等学院,唯独没有公路学院。
- ② 例如,北京建筑专科学校并入清华大学;河北水产专科学校一部分转入上海水产学校,一部分转入山东大学水产系;甘肃工业专科学校并入西北工学院;海南师范专科学校部分并入华南师范学院,部分并入华中师范学院;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被分别转入7所院校。《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文献选载(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三年)》,《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
- ③ 1955年上半年,高等教育部制订了1955—1957年高等工业学校院系、专业调整,新建学校及迁校方案,原接受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学生最多的苏南工业专科学校和青岛工学院因支援内地建校,1956年被撤销。王红岩:《20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214页。
- ④ 《关于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调整结束工作的总结报告》(1953年12月)。

些问题的把握还不够细致,还有待于新材料的发现,但基本能够反映群众运动在一个基层单位可能发生的各个层面。华东交通专科学校从创办到被撤销,仅仅生存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对于学校无疑是一场悲剧。然而,也就是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以学校为舞台,上演了一场剧情跌宕起伏、结局又匪夷所思甚至近乎荒唐的大戏,其间,权力运作和出场人物位置的变换,令人眼花缭乱,影响波及整个新中国的社会发展,不少人积极地投入、参与,更多的人则怀着各种复杂心情紧张地观望、揣摩,又好似喜剧或闹剧。这正是1950年代初期大变革时代社会发展特征的鲜明写照。

1950年代初期的中国,既是百废待兴,又要高速发展,革旧与创新同时并举,自然会形成一定的紧张关系。群众运动的全能性,提供了一揽子解决的动员参与形式,故这一时期群众运动频发,多个大规模群众运动同时或交叉进行,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复合群众运动中,不同群众运动或重大工作目标往往互相支持和补充,或某一运动的内容,是实现其他运动或重大工作目标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运动单一形式与目标多样性之间存在距离,运动过程中又可能产生某种冲突,背离发动时的目标设想,革命的产物或经验反会成为改造或斗争的对象。

就本文所涉范围,“三反”运动有助于改善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极大地推动增产节约运动的开展,同时,大规模群众参与形成的政治压力,又能带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开展,推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的进行,并为部门、单位领导提供了日常管理中的便利。但是,在具体运作上,部门、单位领导在领导反贪污斗争时往往有声有色,反浪费也有可能成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理由,可反官僚主义的内容,因要求领导首先带头检讨并接受群众批评,故往往动静不大,惧怕惹火上身。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也充满矛盾,差不多是急速发展扩张和有限调整收缩同时进行,既能成为国家改造高等教育的工具,也能为部分普通群众提供选择机会,利用调整反抗或逃避所处的环境。运动的缺陷或遗留的问题,都可能成为新运动发起的原因和条件。

“三反”运动发起时，中共中央要求“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①表明自上而下的组织控制能力之强。然而，群众运动又要求自下而上的发动，以便激励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在某种程度上也扩大了群众的参与权力。所谓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在运动很难拿捏，通常是运动初期偏重于自下而上的自发性，因此，可能造成权力的分散化或破碎化，导致权力位置的移动，又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整顿纪律，重建秩序和权威。“黄逸峰事件”表明，复合群众运动的可控性很弱，突出表现在由于高层领导对于多重目标选择的变动，需要在运动中反复调整政策。群众的参与行为也很难控制，在响应号召投身运动的同时，也会夹杂一些个人的诉求，这些要求又可能与运动目标相悖。因此，依据运动计划和既有经验领导运动就缺乏现实可行性，报纸无法充当运动导向的角色，部门、单位首长也不能始终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运动结果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增强。“新三反”一经发起，原强势领导的所谓“独立王国”就显得十分脆弱，面对新权威、新目标很快分化、解体。另一方面，当新领导借助群众运动批判错误的旧领导时，自身权威性也遭到质疑，原来靠拢组织、服从领导的团员、积极分子可能会与新领导保持距离，全能性强势领导的权威在群众运动中被逐渐削弱。

在复合群众运动环境下，群众如何选择最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为呢？“黄逸峰事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薛承凤利用反官僚主义和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批评学校工作并建议将学校并入其他大学，并如愿以偿地由一所刚组建的专科学校转入上海交通大学，吸引了更多学生试图借批判运动“搭便车”。但是，能够真正在群众运动中获利的小人物只是极少数，且多为一时的表面现象，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通过群众运动改变自身命运，结果甚至可能更糟。

但是，群众运动对普通群众依然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因为运动提

① 《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页。

供了表达意愿和采取行动的方式与机会。“黄逸峰事件”又表明,个人或群体意愿的表达,必须借助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而群众运动话语的学习和使用,在复合群众运动中并不十分复杂。群众运动话语的成功模仿,要点是使用当时运动的基本概念和选择符合运动目标的一般内容,并以阶级分析强调行为动机的纯正性,重要的是展示某种态度或姿态,而非特定事实的讨论。因此,当借助群众运动话语表达个人或群体意愿时,就可能随波逐流,又不想为自己的言论承担责任,而个人或群体的意愿,也往往会被湮没在政治表态和批判之中。所以,当新型学校的创办由革命行为转而成为“好大喜功”的牺牲品时,剩下的大多是一些群众运动话语的自我演绎,需要认真清理才能看到某些原本的面目。

必须注意,在“黄逸峰事件”中,所谓压制批评的行为和反对压制批评的斗争,使用的方式基本相同,都是群众运动式的有组织行为,只是斗争对象有所不同,领导运动的组织层级有所上升,乃至需要最高层的直接干预。这种情况表明,群众运动的参与方式已经影响到日常管理,特别是当危机出现时,部门、单位很容易也很熟练地使用运动方式去应付,虽然在运动中群众获取了一些独立的活动空间,但可能利用的参与方式却十分有限,而且其行为是否恰当,需要由上级权威进行判断。当群众行为超出运动目标,或有可能动摇组织和秩序时,无论斗争对象如何,都会采用整顿纪律的办法加以遏止。在群众运动中,不但部门、单位领导者随时可能发生位置、角色的移动,群众也必然会成为被整治的对象,这也是群众运动的重要特征。

历次群众运动均号召群众抵制或不服从错误领导的错误决定,并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是,如何判定正确与错误,却是群众运动始终无法解决的问题,是紧跟或是反戈一击就成为极为困难的行为选择,多数人只能“随大流”。当报纸公开批评成为群众运动的重要参与形式时,报纸却无法承担澄清事实、分辨是非的责任。“新三反”运动

要求进一步加强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①随之,各地区党政机关对报纸批评的抱怨增加,诸如:“批评的原则性不高,有时分寸掌握不够恰当;重点报道不够突出,又很不平衡;报道中在处理‘中央与地方’‘个人与组织’‘领导与群众’等原则问题上,曾经发生过错误。”^②表面上是对批评原则理解、把握和运用的水平问题,实质则是党报如何能在充斥群众运动话语的批评中确保“事实”。

在高调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同时,报纸上涉及批评的报道却有所减少,转而用加强内部参考资料的采写、编辑工作的办法,作为向中央负责人提供情况的补充,以减轻可能出现的组织摩擦和防止运动失控。并且严格规定:“记者写参考资料时,只负责客观真实地反映情况,不对所反映的问题作出结论,也不要向有关方面提出处理的要求,记者不得参预当地的争论,不得干预当地的工作。”^③对此,毛泽东提出:“关于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管、好’的三字方针。”^④习仲勋在中共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中,将“三字”方针概括为三点:“报纸上的批评必须开展,批评必须正确,批评必须在党委的领导

① 《人民日报》在公开揭露“黄逸峰事件”的前夕,刊登了一篇《各地各级人民政府应更加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通讯,强调此项工作的重要性。《人民日报》1953年1月19日第1版。1953年2月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华东一级机关处理人民来信和接见人民群众工作的汇报会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要求各个机关,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人民监察机关和党的报纸,要通过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了解情况,“有意识地、主动地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特别是向黄逸峰那样的品质恶劣的有权有势、形成一个集团的坏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汇报会议检查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工作》,《人民日报》1953年2月23日第1版。

②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改进〈大众日报〉工作的决定》(1954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421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1953年7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250页。

④ 毛泽东:《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1954年4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年,第177页。

下进行。”^①第一点是一般原则,“批评必须正确”显然是确保批评能够正常开展的核心,第三点则是报纸进行批评工作的职权范围和方法,其中,“批评必须正确”的要素应包括:批评必须基本符合“事实”和必须持“治病救人”的态度,所谓“事实”又必须“让它们的某些细节在实事求是的讨论的过程中弄清”。^②

“黄逸峰事件”说明,在复合群众运动的环境下,“三字”方针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想要在三点间保持平衡并全面贯彻落实,几乎没有可能。在这一事件中,华东交通专科学校的领导、学生和学校本身,都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损害,远远超出了各自行为的原本期待。而且,作为共和国历史的重要事件,改革开放后,除了黄逸峰个人得到了一个“主要错误属实”,“但不应定为反党分子,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③的组织结论,对其在遭遇不公正对待后仍能坚持历史研究及理论探索,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组建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贡献,有了一些高度赞誉的评价外,继任者的行为和学校干部、教师、学生的经历,是否由于事件之发生受到某种影响,就如同学校短暂的命运一般,被湮没在群众运动的混沌之中,难以给予清晰的解释与评说。

(刘一皋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① 《习仲勋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1954年5月),《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第311页。

② 胡乔木:《致读者》(1956年7月1日),《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胡乔木谈新闻出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9页。

③ 1980年12月6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上海市委1980年8月29日《关于黄逸峰同志复查意见的报告》批复的内容。《一个传奇式的共产党员——黄逸峰的一生》,第92页。

journals, stone inscriptions and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particular, the details are carefully examined in regard to its establishment, the mass mobilization it invoked and the struggle it waged with the British Consulate, all the elements that causing constant upgrading of the event, after 1908 when the Rally and Association Law was enacted, were presented. Furthermore, the event was compared with the Shenguang Temple Incident in 1850 and the impact of such modern social changes on local power structure was analyzed.

Propaganda, Behaviour Patterns and End Results in the Complex Mass Movement: An Analysis of the Huang Yifeng Affair

Liu Yigao

【Abstract】 There were many mass movement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RC. Their characteristics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s: several movements occurred simultaneously draining the state of a great deal of resources, rendering those political events extremely difficult and complicated for all the participants active and passive. Using as examples the Huang Yifeng Affair and the foundation and the disbandment of the East China Communications Junior College, this essay discusses the manners the authorities organized these movements, describes how students through joining the movements expressed their own desires and opinions, and examines the shifts of power in the process of these complex mass movements. The essay also analyses the verbal expressions and the manners of behavior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leaders within the different contexts.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mass political movements during the early times of PRC often lacked clear purposes, and the local leaders of CPC tended to lose control after they had initiated them, bringing about severe and unexpected political injuries upon themselves and all those

Book of the Dead in Ptolemaic Egyptian Temples

Yan Haiying

【Abstract】 Since the Late New Kingdom, there was a strong tendency of integration of worship of sungod Re and god of the dead Osiris, this is evidenced not only by the interface of architectural features and functions between tomb and temple, but also by mortuary liturgies and mortuary literature. During the Ptolemaic period, the most important mortuary text—Book of the Dead, the copies of which had been mostly found in the tombs, appeared in the temples. This paper will analyse the chapters of Book of the Dead found on the reliefs of Dendera temple and the change of idea of afterlife in the tomb culture. Because of this change, the Egyptian formula of immortality through righteousness influenced later concept of salvation, and an element of ancient Egyptian religion thereby was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Western cultural memory.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Confucianism by Ogyu Sorai:

An Analysis of His First Book *Ken'enzuihitsu*

Yang Jikai

【Abstract】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nationalist researches, this paper argu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that the paradigm shift of ideas, that happened in the middle of Tokugawa period in Japan, was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even influence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1911. Based on analysis of his thoughts, experience of life and his first book *Ken'enzuihitsu* (護園隨筆), this paper analyses his reconstruction of new Confucianism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his understanding of